

目 录

- 论武昌起义的经验和教训……………竺柏松(1)
- 辛亥革命时期留学生的爱国主义……………吴雁南(24)
- 辛亥革命前的贵州社会……………莫健 雷永明(37)
- 贵州自治学社早期的政治主张……………钟德宇(60)
- 从改良到革命——评贵州自治学社……………马凤程(75)
- 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哥老会……………周春元(98)
- 论辛亥革命时期贵州立宪派的分化……………李 实(120)
- 试论贵州军政府中革命派的内部斗争……………范同寿(144)
- “二·二事变”与黄泽霖之死……………杜文铎(163)
- 唐继尧督黔的由来和发展……………荆德新(174)
- 滇军入黔与云南都督蔡锷……………袁昌隆(190)
- 贵州革命派的反唐斗争……………顾大全(211)
- 钟昌祚试评……………胡克敏(223)
- 辛亥革命前后的任可澄……………李双璧(234)
- 贵州辛亥革命主要书目资料索引……………吴敦俊整理(250)
- 后记……………(260)

论武昌起义的经验和教训

竺柏松

武昌起义是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是关系辛亥革命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武昌起义是以文学社和共进会鄂部总会（以下简称共进会）为代表的湖北革命党人具体组织和领导的，并在起义后数小时内就击溃了敌人的反抗，占领了总督衙门和武昌城；又在不到三天内光复了整个武汉三镇。所以，武昌起义确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城市武装起义。在起义胜利的影响下，一个多月后，全国大多数省份宣告独立；两个多月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四个月后，清帝逊位，结束了已持续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能取得这样迅速和重大的胜利，武昌起义成功所起的号召和鼓舞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武昌起义的历史又告诉我们：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装斗争方面不愧是英雄，可是在政治斗争方面却十分幼稚。他们不懂得政权对革命的重要性，在起义取得胜利后的第一天，就自动请出黎元洪、汤化龙等反对革命的旧官僚和立宪党人执掌新政权——湖北军政府的领导权。这就必然导

致新政权向右转并日益反动。因此，可以说，武昌起义胜利之日，也就是革命开始失败之时。由武昌起义开创的旧人物组织新政府的先例起了恶劣的影响：首先是响应各省相继效尤，在“新旧合作，咸与维新”声中，原与革命为敌或素无联系的旧人物摇身一变成了革命派，捷足先登，粉墨登场；由于没有各省的支持，孙中山只做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被迫让位于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袁世凯大权在手，就敢于刺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进而恢复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破坏无余。所以如此，武昌起义在政权建设方面的错误先导作用也是难以否认的。

武昌起义是整个辛亥革命的一幅缩影。其成也快，其败亦速，是武昌起义明显的历史现象和特点，也是整个辛亥革命的历史概貌和特点。因此，深入研究武昌起义的历史，探究其武装起义成功的经验和政治革命失败的教训，这对了解整个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具体认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武昌起义成功的“主因”和经验

武昌起义成功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认识并不一致，即如孙中山先生谈及此事时，也有失之于简单的地方，他曾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并

把它归结为是“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①的问题。

事实是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同盟会在湖南、两广和云南等地先后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为了推翻反动的清政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切实的组织，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开始认识到过去的路子有问题，在上海筹组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另谋革命进行办法。在《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中，他们指出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而所搞武装起义之所以“屡起屡蹶”是由于“轻举妄动”，“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于侥幸以成事”^②。这个批评是符合实际而中肯的。还应当指出的是，十次起义所选择的发动地点也不恰当，因为大多处于沿海或边陲地区，即使起义成功了，对全国的影响也不大。

武昌起义所以一举成功，恰恰就是吸取了十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避免了上述缺点和错误的结果。武昌起义成功的“主因”，一是由于正确地选择了号称“九省通衢”又具备起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的全国中心地区——武汉作为发动起义的地点；二是由于湖北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长期而踏

^① 《孙文学说·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2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90—91页。

实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新军这个反革命武装逐渐转化成了革命武装。下面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一、正确选择了发动起义地点

湖北革命党人以武汉为发动起义地点，已为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选择之所以正确，主要是因为张之洞所搞的“新政”为起义准备了雄厚的人才和物质基础。张之洞是清末“新政”的倡导者和积极推行者。他督鄂近二十年（1889—1907），一生最重要的所谓政绩就在武汉地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建设了颇具规模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和湖北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了师范、军事、铁路、测绘等各类新式学校；向西欧和日本派遣了在当时各省中数量最多的留学生；训练了一镇和一个混成协的“自强”新军，在当时各省中也是数量最多、装备最好的，等等。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湖北都居当时全国各省之冠，故有“模范省”之誉。

可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表明：原来意在巩固统治的东西却转化成了破坏统治的因素。大批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和新式学校的学生成了发动武昌起义的领导和骨干力量；新军士兵成了武昌起义的基本动力；兵工厂和丰富的财力保证了革命党人坚持斗争了两个月时间。比如，武昌起义后，查明湖北藩库和官钱局等处有“现银二百二十万两，现洋一百万元，铜元六十万封……，官票二百八十万张（每张

等于当十铜元一百枚),银元票二百四十万张(每张代表银元一元)”^①,合计有一千万元左右。当时军政府每月开支约百万元,因此可供十个月之用。又比如,武汉地区储存了大量军事装备。单是楚望台军械所所存武器数量,就有“德国新旧毛瑟枪五千余支;从日本购来的,有六米里五枪一万五千支;汉阳造步枪二万六千余支;收缴陆路巡防营之枪三千余支;子弹更不计其数。又存汉阳兵工厂造五生七山炮三十余尊;江陵机器厂造六生地明条炮十二尊、四生地快炮六尊、七生地陆路炮二尊,又七生五陆路炮一尊;英国造十一生的老式炮一尊;日本三一式七生五野战陆路炮三十六门,山炮十八门”^②,这就保证了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实行扩军和长期作战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武昌起义后,湖广总督瑞澂就密电清廷,企图把罪责推到已死的张之洞身上。他说:“现在兵工厂、军械库、藩盐各库、官钱局悉被占据。综计全省新军,除去调赴川省暨列防宜昌、郧阳、施南各处外,其未叛者仅此辎重营一营、步队一队、马队一队而已。此皆升任总督(按指张之洞)费十数载之经营、糜数百万之库帑辛苦选练,而不料其均为匪用也。”^③后来,一个为张之洞树碑立传的人也说出了同样的话。他说:“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按指张之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58页。

② 《鄂州血史》第83页。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9—170页。

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当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赆,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观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扼全省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供应;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①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从反面证实了湖北革命党人以武汉为起义地点的正确性。

二、把反革命武装转化为革命武装

光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而没有革命的主观条件相配合,革命是不会发生和成功的;因为任何反动统治者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革命是需要人去组织和发动的。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主要是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而卓有成效地经营的结果。

正因为武汉地区有利于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早在同盟会成立前,湖北革命志士就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确定了“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②的指导思想并付之实践。当时科学补习所的领导人刘静庵、胡瑛、张难先、朱子龙等都亲自投入第八镇工程营当兵,运动同伍,秘密宣传革命。到一九〇七年,蒋翊武和刘

^① 张春霆《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37年版第7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547页。

复基从上海回到武昌，加入新军，革命党人把反革命武装转化成革命武装的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实践已表明：湖北革命党人（特别是其中的文学社）对新军所做转化工作是武昌起义得以一举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没有这种转化工作，武昌起义就发动不起来；即或发动了，也无法成功和坚持。

湖北革命党人把反革命武装——湖北新军转化为革命武装的工作为什么能取得成效？

首先，湖北新军具有革命化的内在的阶级根源和有利条件。湖北新军的成份“多系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①和一部分家境困苦而无力上新式学校或出国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和他们的父兄一样都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痛苦，大都具有改变现状的革命要求。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士兵“是有自己的利益的活生生的人，是人民的一部分，是我们社会的某些阶级的迫切要求的表达者。……他们遭到长官连续不断的殴打，他们被长官弄得呆头呆脑，他们受到机械的训练，你们可以看到，士兵……所提出的要求，比立宪民主党人的纲领，不知要进步多少！”^②这完全符合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士兵的状况。湖北新军大多是农民出身，确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也遭受长官的虐待和机械训练；他们天然地表同情于革命党人。因此，只要革命党人亲身入伍，同他们交朋友，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就会很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3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71页。

快接受，并愿意参加革命组织，成为一个革命者。原文学社成员李六如先生写的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中叶得胜这个人物，就是当时湖北新军士兵的典型形象和被转化的典型例子。

另外，湖北新军具有被转化的有利条件，就是湖北新军士兵具有较高的文化。这就为革命书报的流传和革命思想的灌输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九〇三年，清政府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就断绝了广大知识分子以往应试、中试、向上爬的老路。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家境富裕的就出洋留学或上新式学校；而多数贫寒子弟就走上了进新军当兵的道路。武昌首义老人陈孝芬回忆道：“我是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黄陂应募入伍者。那次募兵的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①可见当时秀才当兵之多。据不完全的统计，知识分子在湖北新军中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除此以外，张之洞创办的陆军小学堂（后改名为陆军特别小学堂）对提高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促进新军革命化，也起了不小作用。为了造就大批下级军官，张之洞挑选了部分粗通文墨的新军士兵留原营进陆军小学堂学习。原定名额为三千名，后来只招收了一千名。一九〇七年张之洞入军机处。以后，这一千名学生虽都先后毕业，但无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8页。

法安排职务，只是给他们加少数薪贴仍回原部队当兵。这就在客观上为革命党人的转化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有人论及此事的后果说：“革命之说之行也，首受其影响为学校。军队中官长抱革命思想者，亦未敢与兵卒谈心。自有特别小学堂，而此千人者皆营中故人也。既自学堂归，出其所得从容而讨论焉。故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①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列宁总结俄国一九〇五年莫斯科起义的教训说：“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单独行为，认为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在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军队必不可免的动摇，一定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②湖北新军的向革命转化也不是单纯的说服教育工作的结果。湖北革命党人所做转化工作所以取得成效，不仅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符合广大新军士兵的要求和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日趋高涨，而且还应该看到他们在转化工作中所创造的许多成功的活动方式的巨大作用。

湖北革命党人主要的活动方式和成功经验就是亲身入伍当兵。做军队的转化工作，没有这一条，其他都无从说起。湖北革命党人原来都是一些上过新式学堂或留过学的青年知

^①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申报馆刊本第4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54页。

识分子。比如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都曾留学日本。蒋翊武还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学习，主编过上海的《竞业旬报》；刘复基则主编过汉口的《商务报》。在当时，他们都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但为了革命，他们脱下长衫；不怕艰苦，甘愿投入新军当一名普通士兵。刘复基更是一个瘦弱的书生，但他说：“愚公可以移山，难道我刘复基连枪杆子都拿不起，那还革什么命？”^①这表现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湖北革命党人另一条成功经验是发展组织极为慎重，而且采取了便于发动、指挥的标、营、队代表制度。比如工程第八营的革命组织成员“纯系目兵，官长与教职员则不得参与，恐彼等为利欲所薰，一旦有事，不愿为革命牺牲也”^②。这个措施保证了革命组织的纯洁性和不易被破坏。十月十日晚上起义时，虽然蒋翊武、孙武等主要领导人不在场，但起义的革命党人仍能有条不紊地按原定计划统一行动，就是依靠了原有严密的标、营、队代表制度。

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的多数已被转化到革命方面来。其中有多少是参加了文学社或共进会的革命党人，说法不一。有的说：“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约一万五千人（按：李春萱回忆为一万六千多人；熊秉坤回忆为一万八千七百多人），纯粹革命党

①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第176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29页

人将近二千人，经过短期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动摇不定的。”^①另外，在武昌起义的前五天，黄兴根据居正派人到香港的报告，在给冯自由的信中也说湖北革命党人“现人数已得二千左右”^②。但原文学社成员的估计数字要大得多。如章裕昆说：“当日文学社诸同志占湖北全军十之七八。”^③如果按湖北全军共一万五千人计算，十分之七就有一万多人。此说显系夸大。“前文学社同人”在《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之历史》一文中说，“川路事起，……本社社员增至三千余”^④。关于革命党具体人数，虽然说法不一，但当时革命党人加上同情革命的分子的力量已在新军中占优势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关于直接参加武昌起义的新军数字，由于部分新军外调，据统计，“起义时驻在武昌城内外的湖北新军不过八千人左右”，而“当夜参加革命的不过四千人”^⑤，这就是说，约占全军一半的士兵参加了起义。因此，难怪当时清廷称武昌起义为“兵匪构变”，而一些清朝官僚则称之为“湖北兵变”或“新军之变”。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武昌起义实际上是湖北的士兵革命，是士兵群众作了清王朝的掘墓人”^⑥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1页。

② 转引自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5页。

③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6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4页

⑤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72页。

⑥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5页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的命根子。湖北革命党人把反革命武装转化为革命武装，确是一个致敢于死命的“挖心战术”。所以，武昌起义后，即使瑞澂不逃，也将取得成功。武昌起义成功的“主因”和主要经验就在于此。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指出，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广泛程度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彻底性程度。士兵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仅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湖北革命党人只发动新军士兵作为革命的基本动力，这在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革命暂时的、局部的胜利是有可能的，但要取得长期的、彻底的胜利就不行了。在武昌起义酝酿时期，湖北革命党人几乎唯一地只在新军中工作，单纯地准备武装起义，而对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民则缺乏联系和组织；武昌起义胜利后，也没有有意识地去进一步组织和依靠自发兴起、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由于没有本阶级的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有组织力量作后盾，少数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就“感到势单力薄”^①，并严重缺乏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去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黎元洪、汤化龙等求助，并迫不及待地、自动地把新政权的领导权让出去，也就成为可以理解和必然的结果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因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1页。

此“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所以，单从武装起义的角度说，湖北革命党所做新军转化工作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但从政治革命或国民革命的角度看，这种单纯做军队转化工作的做法，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阶级局限性的表现和失败的教训了。

请黎元洪出任都督的原因和教训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可以保护和发
展革命；没有政权，也就丧失一切。而所谓政权，主要就是
哪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但是，由于阶级
的与时代的局限，武昌起义时的湖北革命党人认识不到这一
点，却主动地把新政府的领导权拱手让给黎元洪、汤化龙
等，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从而必不可免地导致了武昌起义
和整个辛亥革命的失败。因此，武昌首义老人温楚珩曾正确
总结道：“黎元洪之被推为都督与立宪派官僚政客等乘隙窃居
政权，为辛亥革命必然归于失败之主要原因。”^②

但是，关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过程和原因，历来有不同的
说法。或说是由于当时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
导人都不在场，因而给黎元洪、汤化龙等“与革命无关的旧
人以因利乘便的机会”^③；或说是由于革命党人“接受立宪派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6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1页。

③ 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3页。

的提议”^①；或说是由于黎元洪、汤化龙“他们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阵营，企图把领导权抢到自己手里”^②的结果；或说是由于黎元洪个人之“机运”和“邀天之幸”^③；或说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缺乏历史知识”^④；等等。上述诸说，有的不符合历史实际，有的把原来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的是唯心的，因此也就难以成立。也有少数同志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如李时岳同志根据万迪庥《与曾省三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书》，认为是由于“当时革命党人政治上的幼稚与软弱以及由于革命党内部派系矛盾而不惜推举党外人士为都督来消弭争端”^⑤。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则认为这是由于革命党人对建立政权问题“缺乏准备和软弱退缩，错误地认为革命政权需要旧势力中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号召领导”，因而“强行拥立”^⑥黎元洪为都督。最近，皮明庥同志根据孙武未刊稿本《武昌革命真相》所述，指出“拥立黎元洪为都督是革命党人早有酝酿的，并非起义后的仓猝决定”和“在会上正式提议黎元洪为都督的，仍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刘庚藻或其他人”^⑦。我基本上同意以上三位同志的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第188页。

② 《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下册第828页。

③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1页。

④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页。

⑤ 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75—76页。

⑥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第127页。

⑦ 《黎元洪是怎样被拥立为都督的？》，《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83—84页。

分析和论断，下面就此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根据万迪庠（即万鸿阶）解放前写的《与曾省三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书》^①和解放后写的《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②、孙武未刊稿本《武昌革命真相》、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武昌开国实录》和章炳麟“遍询倡议诸人”后所作《黎公碑》所述，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至少在武昌起义三个月以前^③，湖北革命党人就已经酝酿并且基本决定请黎元洪出任都督了。因此，所有“乘机”、“投机”、“阴谋抢夺”等都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湖北革命党人请黎元洪出任都督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由于革命党人屈服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所形成的重声望不重实际、重资格不重能力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用人论资格是一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它理应受到批判、否定；但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本身力量薄弱，又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冲击它。于是，就只有采取妥协、屈服的

^① 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86—87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2页。

^③ 所以说“至少在武昌起义三个月以前”，是因为孙武说是在“辛亥五月初一日”酝酿的，章炳麟说是“议定三月矣”；但万迪庠却说是“辛亥春三月”在武昌洪山宝通寺开会酝酿的。如根据万说，就是在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前五个月了。具体论述可另参阅拙作《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载《江汉论坛》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态度，请出明知不是同志但有“声望”和“资格”的黎元洪来代表他们。在酝酿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时，刘九穗就说：“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①这反映了革命党人屈服于封建历史传统的精神状态。后来，因为黎元洪出任都督，的确促使了各省旧官僚、立宪党人纷纷乘机响应，取得了辛亥革命迅速的但却是廉价的胜利。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好事，实际上却隐伏了无穷后患。以后请袁世凯上台，也是革命党人慑伏于封建资格论的必然结果。

（二）由于参加武昌起义的新军士兵大多来自农村，具有浓重的农民心理。革命导师马克思曾分析说，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②。武昌起义后，在起义士兵心目中，黎元洪就是这样一个“权威”人物。在未宣布请黎元洪任都督前，起义士兵因“群龙无首，急躁者失望，有忿忿作归计者”^③；但当知道黎元洪出任都督时，“士兵有鼓掌欢呼的，并说：‘黎统领也出来了。’”^④《辛亥首义回忆录》的编者也在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一文后加注说：“编者访问首义士兵多人，都说非黎协统出来

① 《辛亥革命史料》第37页。

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③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211页。

④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33—134页。